

论张芝创“一笔书”与赵壹《非草书》

刘小龙

(通渭县博物馆,甘肃 通渭 743300)

[摘要]草圣张芝是“一笔书”的创造者,辞赋家赵壹对汉赋的发展也做出过重要贡献,两人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。赵壹《非草书》一文,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书坛风貌。本文论述了张芝能否在他的时代创造出一笔书,赵壹何以作《非草书》,当时全国“书法热”现象以及《非草书》与鸿都门事件的关系等问题。

[关键词]张芝;赵壹;一笔书;《非草书》

[中图分类号]J292.34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09)20-0084-04

东汉灵帝光和年间,即公元178年前后,在敦煌酒泉(今甘肃酒泉)、汉阳西县(今甘肃天水),分别活跃着两位在中国书法史、中国书法理论史上划时代的巨匠——“草圣”张芝和最早对书法现象进行评论的批评家赵壹。^①对草圣张芝的评价,从古到今有很大的变化:最初的崇拜者“慕张生之草书,过于希颜孔”,^②到唐、宋时开始,有人怀疑《冠军贴》是否为张芝所作;到了当代,有人说张芝创一笔书的说法“骇人听闻之极”,^③张芝似乎再也不配顶戴“草圣”之桂冠了。赵壹与张芝为同时代人,其《非草书》一文论及张芝及其门徒。但此前对《非草书》的研究,大都以为是“经学与鸿都门学斗争的产物”,^④并批判其实用主义书法立场,而未有由此探讨张芝草书特征的。

既然张芝与赵壹因《非草书》一文而有一定的联系,那么由此入手来探讨张芝一笔书的有关问题,可能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。

一

张芝,字伯英,是汉末名臣、学者张奂之子。《后汉书·张奂传》云:“(奂)长子芝,字伯英,最知名,芝及弟昶字文舒并善草书,至今称传之。”唐章怀太子李贤引南朝王愔《文字志》注曰:

芝少持高操,以名臣子勤学,文为儒宗,武为将表,太尉辟公车有道征,皆不至,号张有道。尤好草书,学崔杜之法,家之衣帛,必书而后练,临池学书,水为之黑,下笔则为楷则,号匆匆不暇草书。为世所宝,寸纸不遗,韦仲

将谓之草圣也。

赵壹,字元叔,《后汉书文苑传·赵壹传》记述颇详:“壹貌魁梧,身长九尺,美须豪眉,望之甚伟,而恃才倨傲,为乡党所摈,乃作《解摈》,后屡抵罪几死,友人救得免。”赵壹以赋而名,是汉代后期辞赋创作的重要作家,以《刺世疾邪赋》最为著名。刘大杰先生在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中论曰:“汉代的赋,从张衡的转变开其端,到了蔡邕、赵壹、祢衡诸人,赋才表现了更积极的现实内容和短小适宜的形式,在汉赋的转变上起了很大作用。”^⑤除赋之外,赵壹尚有颂、箴、诔、书、论、杂文等。其所作《非草书》是现存资料中最早的书法批评,是记录当时士人文化、艺术观念的重要文献。

张芝善草书人所共知,但这草书是章草还是今草(小草),或是一笔书狂草,后人的看法却并不一致。赵壹在《非草书》中说:

夫草书之兴也,其于近古乎?上非天象所垂,下非河洛所吐,中非圣人所造。盖秦之末,刑峻网密,官书烦冗,战攻并作,军书交驰,羽檄纷飞,故为隶草,趣急速耳。示简易之旨,非圣人之业也。但贵删难省繁,损复为单,务取易为易知,非常仪也。故其赞曰:临事从宜。而今之学草书者,不思其简易之旨,直以为杜崔之法,龟龙所见也,其蚕扶柱桎,诘屈友乙,不可失也。龇齿以上,苟任涉学,皆废仓颉史籀,竟以杜崔为楷,私相取与,庶独就书,云适迫遽,故不及草草,草本易速,今反难而迟,失旨多矣。

赵壹认为,秦末为适应战争,从急速、简易的需要出发,产生了隶草,^⑥又称“章草”。但是,从秦末到赵壹生活的时代,经过了将近400年的历史,草书与其产生初期相比,发生了很大变化,已经不再是简易实用,而是“蚕扶柱桎,诘屈友乙”、“难而迟”了。

凡有过临习草书经验的人都知道,今草(小草)与章草相比,无波磔燕尾,写起来不难,符合草书简易之旨。目前出土的大量两汉竹简证明,章草产生后被使用的同时,就产生了今草(小草),早在西汉,章草和今草已经混用。所以,赵壹所批评的“难而迟”的草书,应当不是人们早已使用而习以为常的今草(小草),而是面貌全新的草书——“一笔书”狂草。

那么张芝以一己之能能否创造出迥异于章草和小草的“一笔书”狂草呢?答案似乎是否定的。学术界普遍认为,一种书体的产生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创造,一种书体的成熟也要经过很长时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。张芝生活的时代,应该只有章草和今草(小草),署名张芝的《冠军帖》等应为伪托。但笔者以为,《冠军帖》与章草确实大不相同,但与小草区别并不很大。“一笔书”狂草是在今草(小草)基础上产生的。今草发展至汉末已非字字独体,而是“点画之间,莫不调畅”,相当精熟。草书名家杜度、崔瑗等已有连绵小草广为流传,不然,赵壹怎会批评“今之学草者,不思其简易之旨,直以杜崔之法”?不过他们还是小有连绵,是“一笔书”的前奏,只有张芝以其前无古人的感悟,“家之衣帛,必书而后练,临池学书,水为之墨”的功夫,“超俗绝世之才,博学余暇,游手于斯”的学养,^⑦从小草的连带中概括创造出了一种新的、属于自己的书法语言——“一笔书”狂草。

客观上,张芝所处之时代,不但草书已大量通行,而且书法已经被当作一种美的艺术品来鉴赏、玩味,书法家已比比皆是。当时的社会现实,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:“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,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、极解放、最富于智慧、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,因此也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。”生活于此时的张芝自然也不例外——“知汝殊愁,且得还为佳也,冠军暂畅释,当不得极踪,可恨吾病来不辨行动,潜处耳,终年缠此,当复何理耶……”^⑧心灵的苦痛使其必然要在精神上找到寄托,求得宣泄,但通过点画精微、字字独立的章草和今草,是无法抒写一泻千里之激情的,于是,一种狂放恣肆、飞动流走的线条便在他的笔下如渴骥奔泉般流出,这就是狂草。它是朝代的必然产物,也只有这种时代,才能使书法家忘却功

利,直抒胸中不平,产生最能自由挥洒、物我两忘、抒发激情的一笔书狂草。张芝无疑是时代的巨子、最天才的艺术家,无怪乎后人要以“草圣”称之。

其实,在前人的言谈记录中,也能得到草圣张芝所擅长之草书是狂草的佐证。生活时代离张芝不远的韦诞评云:“芝学杜度,转精其巧……超前绝后,独步无双。”“书圣”王羲之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位先于己的“草圣”,并推崇不已,云:“顷寻诸名书,钟张信为绝论,其余不足观……吾书比之钟张,钟当抗行,或谓过之,张草犹当雁行……吾真书过钟,草故减张。”^⑨他总是将张芝与三国魏时的真书大家钟繇并提。假如张芝没有精熟的“一笔书”狂草,就像钟繇没有成熟的真书,^⑩王羲之能三番五次地赞叹而自愧不及?现存《淳化帖》中二王刻帖,王羲之虽以今草(小草)为主,但诸如《奉对》、《汝不》、《又不能》、《小园》等贴,亦有“一笔书”狂草遗韵。“书圣”自云“草故减张”,应为知己知彼之论,并非自谦。而王献之诸帖,特别列于“法帖第十”的《江州》、《转胜》、《消息》、《委屈》等,无不点画狼藉,狂态百出,与《冠军帖》何其相似,不难看出一脉相承的影子。难怪连目空一切的米芾也赞叹“大令十二月贴,运笔如火箸画灰,连属无端末,如不经意,所谓一笔书,天下子敬第一帖也”,“子敬天真超逸,岂父可比也”。^⑪米芾认为王献之的草书超过王羲之,是因为他能不泥于其父,直接师法张芝的结果。唐人张怀瓘不厌其烦地评赏、推崇张芝也正是因其“一笔书”之故:

伯英章草,学崔杜之法,因而变之,以成今草,转精其妙,字字体势,一笔而成,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,及其连者,气脉通其隔行。

(张芝)尤善章草,书出诸杜度,崔瑗云:“龙骧豹变,青出于蓝。”又创为今草,天纵龙异,率意超旷,无惜是非。若清涧长源,流而无限,萦回崖谷,任于造化。至于蛟龙骇兽,奔腾擎攫之势,心手随变,窈冥而不知其所知,是谓达节也已。精熟神妙,冠绝古今,则百世不易之法式。……韦仲将谓之草圣,岂徒言哉!^⑫

二

赵壹虽与张芝处于同一时代,但思想却大不相同。赵壹愤世嫉俗,他之所以要非贬草书,既因张芝之流使草书脱离实用,变得艰涩难书,失去简易之旨,更是看不惯那么多人痴醉于草书这种“善不能达于政,拙不能损

于治”的小技之中,玩物丧志。

赵壹指出,作为个体的每个人是有差别的,有的手巧有的手拙,有的聪明有的愚笨,就像人的面貌有美有丑,这都是与生俱来的,仿效如何改变的了?书法取决于每个人心手双畅与否,岂能一意强为,即使功夫用到“忘其罢劳,夕惕不息,仄不暇食,十日一笔,月数丸墨,领袖如皂,唇齿常黑,虽处众生,不遑谈戏,展指画地,以草判壁,臂穿皮刮,指爪摧折,见腮出血,犹不休辍”的程度,也是徒劳,而且书法不过是“伎艺之细者”,是最无处用的。

众所周知,马背上得来江山的汉王朝虽然尚武,但同时也重儒。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,特别是到汉武帝刘彻时,对内改革,对外扩张,使西汉王朝经济高度发达,疆土空前辽阔。以儒家为主干,兼取百家形成的事功、向上思想,成为此时人们的心理基础,建功立业成为每个人的主要思想。班超“大丈夫无他志略,犹当效傅介子、张骞立功异域,以取封侯,安能久事笔间乎”,^⑩吐出了士人的心声。辞赋家扬雄毕生为赋,却以辞赋为“童子雕虫篆刻”而不屑,可见其对立功之向往。到赵壹的时代,尽管盛世难再,东汉王朝政治经济已大大衰落,但士人仍以“弘道兴世”为己任,“穷可以守道遗名,达可以尊主致平”仍是他们的追求。^⑪值得注意的是,同时代辞赋家、书法家蔡邕,也有“书法辞赋,才之小者……非教化之本”的言论。^⑫如此看来,赵壹的《非草书》与其说是对如此多人沉醉于草书小道中乐而忘返的社会现实的批判,倒不如说是在其“兴至德,弘大伦”^⑬为圣人之业的抱负难以实现时,不得不以辞赋小道为名的感慨系之。

三

《非草书》这篇非书法家所作的书法批评,现在看来仍不失积极的批判意义,而以有道名世的张芝,却成为“伎之细者”草书之人中的最杰出代表,被后人以“草圣”称传。但两人提示于我们的信息,留于我们的思考,却不仅仅只是这些。

首先,发生于当时的那场“草书热”,应该遍及全国而非地域性的,即并非只限于赵壹所在的汉阳西县一带。

据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载,熹平四年刻成的由蔡邕以隶书书就的《熹平石经》,立于都城洛阳太学门外后,“其观视及摹写者,车承日千余辆,填塞街陌”,可见当时书法的学习是多么狂热,而且不仅仅限于草书。这些学习者自然不是普通老百姓,车承千辆足以证明。这是一种

让人难得其解的现象:一方面是文人士大夫如痴如醉的书法学习热,一方面又是文人士大夫对书法学习的尖厉批评;对待书法的态度,一方面正如蔡邕所说,以为书法是“才之小者,非教化之本”而不屑一提,即使一生从事书法,到头来也回避自己是书法家,从蔡邕时代至今仍未改变;^⑭一方面自古至今,几乎没有文人不沉浸于书道之中,而且书法上成就最高的自然又是这些文人。古代士人一直是不屑于技,他们感兴趣的惟有道。书法只是写字的小技巧、小技能,但却能表达对天地万物的感悟,抒发“喜怒窘穷,忧悲愉佚,怨恨思慕,酣醉无聊不平”等复杂情感。^⑮如果仅仅为了书法而书法,功夫用到“臂穿皮刮,指爪摧折,见腮出血”,也被人看不起。但如果技能达到精熟,如庖丁解牛那么游刃有余,也就“技进乎道”了。既“技”又“道”,这也许是文人士大夫既批评又热衷、既热衷又回避的本衷吧?然而一味的技巧熟练,有池水尽墨的功夫,并非一定能得道,更重要的是技外功的追求。“退笔千冢未足珍,读书万卷始通神。”如果有了“退笔千冢”的功夫,再有万卷书的学养,不就“技进乎道”了?赵壹虽非贬草书,却也指出张芝是在有“超俗绝世之才,博学余暇”后“游手于斯”,才取得那样高的成绩,攀上了草书的巅峰,赢得了盛誉。因为有超俗绝世之才,自然不是只知练字习书的一般书法家,当然要以诗人或其他相称,这也许是文人士大夫既热衷于书法,又不愿以书法家自居的原因吧?

其次,关于《非草书》与鸿都门学的关系问题,很多研究者以为,《非草书》是经学与鸿都门学斗争的产物,是最早对鸿都门学的反应之作。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未免牵强,有待进一步探讨。

产生于汉灵帝时的鸿都门学,是从灵帝建宁元年(168)筹备,至光和元年(178)始设置的学府。其生源有别于太学以经学为对象,而是“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能为尺牍、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”,^⑯并且从鸿都门出去的学生“或出为刺史太守,入为尚书侍中,乃有封侯者”。^⑰汉灵帝对鸿都门学的偏爱,当然要引起太学毕业的的不满,因而引起了经学与鸿都门学的斗争。属于士君子之一的赵壹,应该对此事有所反应。因此,这篇非贬批评草书之文,自然被视为是其反应的产物。但是,细细阅读全文,如果不是有意联系,我们无法从《非草书》中看出赵壹对鸿都门学的批评、刺谏。

召为鸿都门的学生是“能为尺牍、辞赋及工书鸟篆者”。这里有必要对“尺牍”、“鸟篆”作一解释。牍,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牍,书版也。”即用以写字的竹木板,因汉代以长度为尺一寸的简牍书写诏令,称为“尺一牍”。

《汉书·李云传》云：“尺一拜用，不经省御。”唐李贤注曰：“尺一之牍谓诏策也，见《汉官仪》。”这种尺一左右的简牍，简称为“尺牍”，本是各种文书的泛称，后渐被用来特指书信。“鸟篆”应指鸟虫篆，现存汉印有一种字体屈曲、笔画作鸟头鱼形的即是，是一种带有很强装饰效果的字体，其产生也不是为了实用。汉灵帝召能为尺牍者是为了书写各种文书，出于实用，而召工鸟篆者则完全是为了玩赏。所征召之人中，除善辞赋、尺牍、鸟篆者外，未见有善草书者，即使尺牍的书写可以是草书，但也不会是“难而迟”的狂草。而且赵壹已经明言乡邑、朝廷、博士、四科、征聘、考绩六不用草书。张芝被朝廷征召做官，已明言是因有道而非善草书。当时醉心于张芝狂草书者，也应该知道只有学会辞赋、尺牍、鸟篆之一，就有机会出为太守刺史，入为尚书侍中，并且进一步赐爵封侯，但他们却在一无所用的草书上大费工夫，可见与鸿都门学没有什么关系。那么，赵壹批评非贬不为鸿都门学所用的草书，也就并非是与鸿都门学的斗争了。

研究者认为，《非草书》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建宁元年

(168)前后。^②如果一考证正确，则建宁元年灵帝初即位时，鸿都门学还未设置，当时的“书法热”却已存在，并非汉灵帝设置鸿都门学后而产生。赵壹对这一现象的批评，岂是鸿都门学之故？如果《非草书》写作较迟，在光和元年(178)以后，则熹平四年(175)石经刻成后观视摹写的壮观场面，光和元年去京师举郡上计的赵壹应有所耳闻目睹，车乘日千余辆者，应是有钱有地位之人，下层劳动人没有这种条件。何以赵壹视而不言，偏偏非贬草书？可见不管赵壹何时作《非草书》，都与鸿都门学无关。

以赵壹恃才倨傲、愤世嫉俗之性格，如对鸿都门学有所不满，便会直接批评，而不会以非贬草书来旁敲侧击。赵壹流传至今的《解挟赋》、《穷鸟赋》、《刺世疾邪赋》等皆观点鲜明，直切痛快，何以偏偏在此事上变得遮遮掩掩。由此可见，或许赵壹对鸿都门学原本就不是什么反应之作。鸿都门学征召善赋者出可为官，尽管赵壹未因善赋作官，也耻于以此为官，但他毕竟是以辞赋名世的，所以，干脆就不言鸿都门学的事了。

[注 释]

- ①张芝生年不详，卒于公元192年。赵壹生卒年均不详，但光和元年(178)举郡上计到京师，可知两人为同时代之人。
- ②日·中田勇次郎《中国书法理论史》中说：“在如今流传的著中，《非草书》是最早的一种。”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7页。
- ③⑨⑪⑬《非草书》见《书法要录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~2页。
- ④徐邦达：《五体书新论》，见《现代书法论文选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60页。
- ⑤刘正成：《论中国书法的美学化倾向》，《中国书法》，1998年第3期。
- ⑥刘大杰：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53页。
- ⑦杨泉：《草书赋》说隶草“解隶体之细微，散隶体之委屈而粗书之”，就是隶书的草写。见马宗霍《书林藻鉴》，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31页。
- ⑧西汉居延汉简、东汉和帝永元兵器册等均今草、章草混用。参见赵正：《汉简书法论集图录》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。
- ⑨张怀瓘《书断》中语，见马宗霍《书林藻鉴》，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35页。

- ⑩宗白华：《美学散步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08页。
- ⑪张芝：《冠军帖》，见《淳化阁帖》。
- ⑫孙过庭：《书谱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2页。
- ⑬钟繇时代楷书的成熟，刘正成先生曾做过论述，可参看《钟繇与长沙吴简说》，《中国书法》，1998年第1期。
- ⑭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中语，见马宗霍《书林藻鉴》，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51页。
- ⑮张怀瓘《书断》卷中，见《书法要录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131页。
- ⑯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81页。
- ⑰众所周知，林散之是以书法名世的，但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却自题“诗人林散之暨妻盛德粹之墓”。见陈传席《大书法家忌言书法家》（见《梅晚斋臆语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78页）。
- ⑱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217页。
- ⑲韩愈：《送高闲上人序》，见《唐宋文举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220页。
- ⑳㉑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29页。
- ㉒王非：《〈非草书质疑〉驳议》，《中国书法》，1998年第4期。